

埃里克·奥林·赖特“真实乌托邦”理论探析

李静乐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晚期学术生涯的核心是围绕“真实乌托邦”愿景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展开的系统性探索，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诊断为起点，将“社会主义”重新定义为社会权力的扩张，并视社会赋权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权力转向基础和核心路径。通过剖析赖特构想的三种转型策略——断裂式、间隙式与共生式转型，阐明其理论如何将乌托邦式的理想愿景与现实的制度设计相结合。“真实乌托邦”构想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何超越纯粹批判、建构可行性替代方案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但这种渐进性的转型策略也使其饱受伯恩斯坦式改良主义的尖锐质询。

关键词：埃里克·奥林·赖特；真实乌托邦；资本主义批判；社会赋权；制度转型

DOI：10.64216/3080-1486.25.11.067

在苏联模式失败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个根本性挑战：如何超越对资本主义的纯粹批判，进而建构一个既具吸引力又具现实可行性的替代性社会愿景。为了回应这一时代课题，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埃里克·奥林·赖特（以下简称为赖特）提出了“真实乌托邦”方案，试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开辟新的道路。赖特的方案并非零散观念的集合，而是遵循着一个极其清晰的建构逻辑。其一，以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诊断为逻辑起点，回答为何要寻求替代方案；其二，以社会赋权为逻辑中枢，回答何以超越资本主义；其三，提出断裂式、间隙式与共生式三种转型策略，构成了通往替代方案的逻辑终点，并指向“如何促成现实社会的成功转型”这一关键问题。然而，这一路径对渐进性与改良性策略的倚重，是否是伯恩斯坦主义在21世纪的回响？赖特所强调的“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究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妥协，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制度创新与社会转型的务实探索？正如迈克·布洛维所评价的，赖特“实现了从没有乌托邦的阶级分析到没有阶级分析的乌托邦的转变。这一争议构成了理解与评价赖特的理论不可回避的语境。唯有深入其“建构逻辑”，方能揭示其方案与伯恩斯坦式改良主义的本质区别。为此，本文将通过对“真实乌托邦”建构逻辑的层层剖析，论证赖特的“真实乌托邦”并非革命理想的褪色，而是面向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性思考。

1 对现存社会的诊断与批判：资本主义“坏”在哪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任何严肃的解放社会构想都必须从对现存的压迫性社会制度 and 经济结构的深入理解入手。

一般来说，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阐释较多是建立在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或比较基础之上，因此，社会主义通常被视为对这一制度的否定——采用某种“公”有制，通过某种形式呈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一般是透过国家所有制的制度设计来达成的。然而，赖特则从不同于传统对立模式的分析路径出发，并不是简单的将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来理解，而是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出发，在资本主义于国家主义之间重新锚定社会主义的概念。

在这种观察下，欧林·赖特论述了十一条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1. 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使人类不必承受的苦难持续存在；2. 资本主义阻碍了人们充分运用和培养自己的天赋及创造潜能；3. 资本主义让个人自由及自主性中原本可以消除的缺点持续存在；4. 资本主义违背了自由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原则；5. 资本主义在某些重大的面向上没有效率；6. 资本主义整体上会偏向消费主义；7. 资本主义会破坏环境；8. 资本主义商品化威胁了广被推崇的重要价值观；9. 资本主义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给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火上浇油；10. 资本主义侵蚀了社群；11. 资本主义限缩了民主。最后，赖特又进

一步指出,当前资本主义的固有特质和发展方式,自我修正或者说自我完善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上述十一条判断失误,那么想改善这些命题所谈到的伤害的目标,最终都指向对抗资本主义本身。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否则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将变得徒劳无功。

2 通往替代方案的权力转向: 社会赋权

赖特在构建资本主义制度替代方案的理论框架过程中,社会赋权是他制度重构的核心机制,他所主张的社会赋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集中,而是强调在国家 and 经济两个关键领域推动公共参与,使国家权力和经济权力服从于社会权力,从而构建一个既民主又平等的社会体系。更确切地说,在所有制、经济资源的使用以及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上,社会赋权的程度越大,这个经济体就越可以被认定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不是简单的取代私有制为公有制,而是要扩大公民社会的权力,使社会成员能够对国家和经济领域施以真正的民主控制,从而建构一种“社会控制国家与资本”的制度形式。赖特将这种策略称之为“嵌入式制度替代”,即通过在国家和经济之外构建增权的社会结构,以逐步改变社会整体的权力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赋权才有了生长的空间。通过具体的制度实验促成逐步转型,扩大社会赋权的范围,直至形成“去资本主义化”的趋势。

在赖特看来,无论“社会主义”如何定义,其关键在于“谁掌握生产与资源分配的控制权”。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国家集中所有生产资料、执行中央计划,从上而下实现制度替代,相对地,社会赋权式社会主义则主张由公民社会中的自治集体自上而下组织活动。他将这类根植于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的经济活动统称为“社会经济”,即由自治集体直接组织商品劳务生产和分配。在此框架下,赖特举例阐述了以下实现社会赋权的五类经济制度方案:无条件基本收入、社会资本主义、合作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和参与市经济。当然,上述制度并非互斥选择,而是相辅相成,从而为经济民主化奠定基础:基本收入制度为社会经济和合作社的形成提供原始动力;各种社会资本主义机制培育市场合作潜能;合作社治理深化民主经济组织形式;市场社会主义则通过

削弱私人资本支配地位,扩大了公民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参经济为政治动员提供价值愿景和道德支持。在这些制度框架下,逐步构建新的社会赋权空间,并在国家和资本的良性互动下推动替代方案的普及与扩展。

3 创造真实的乌托邦

在赖特“真实乌托邦”的理论框架之下,这一系列通往社会赋权路径的制度方案,构成了一个极具解放潜能与实际可行性的制度结构清单。这些社会安排在各自领域内确实有助于推进社会赋权的实现,但若想真正动摇资本主义所构建的权力混合体,单一方案往往难以奏效,必须仰赖这些方案的互助及协力作用。由于资本主义仍主导经济结构,精英阶层具备足够的权力来遏制任何实质性推进社会赋权的运动。所以,问题就在于思考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型,让那些既具有解放性潜能、又在现实中具备可行性的“真实乌托邦”方案成为可能呢?在赖特看来,就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关于社会转型的理论来理解和设计如何实现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提升社会赋权的能量。在这一转型理论中,赖特系统地阐述了三种策略逻辑:断裂式转型、间隙式转型、共生式转型。

其一:断裂式转型。断裂式转型是指通过与现存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彻底决裂来创建新的社会赋权形式,以相当快的方式建立起新制度。他解释道,断裂式策略不一定需要建立在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基础上,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可以通过选举获得足够的权力来发动断裂式转型。然而,“任何与资本的断裂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混乱,也会产生牺牲”,且“必然会导致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这种转型低谷可能会导致一个由民主机制选出的社会主义政府失去民众的支持,无法在一定时间内得到足够坚强且坚定不移的政治支持,致使该国家或地区退回至资本主义,唯一的结果就是转向威权统治,根据赖特的说法,这将永久地破坏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此,断裂式转型的逻辑不必局限于整个社会体系的全面断裂,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能包含某些制度的断裂,也可能包含赖特所说的其他制度的“变质性”变革,有时只需局部、有选择地介入断裂,便能为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赋权铺路。

其二:间隙式转型。社会理论中用“间隙式”这个

术语来描述那些发生在社会结构的空间和裂缝中的不同过程。间隙式策略即是指“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系统而有意识地开展间隙活动”。在资本主义结构中，间隙式策略强调了两种可能的社会转型路径：1) 改变最终导致破裂的条件，2) 逐步扩大其运作的有效范围和深度。第一种路径体现了革命无政府主义的逻辑，通过在裂缝中构建可赋权的实践，创造促使断裂发生的条件，并缩短社会转型中的低谷期，间接证明了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可能性，也有助于促成断裂的政治意愿。尽管赖特将这种观点归结为革命无政府主义观点，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走向断裂的社会主义建设策略。第二种路径反映了演进式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会对间隙活动的增长施加约束，因此，转型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生，而无需断裂。这种过渡的间隙式策略在学界引发了广泛批判。在赖特看来也是如此，很难看出间隙式策略本身会如何削弱资本权力。

其三：共生式转型。共生式转型的基本理念在于：当社会赋权的进步有助于解决统治阶级面临的问题时，社会赋权的推进将更加稳定且更容易捍卫；当社会赋权以某种方式服务于统治群体的利益，并解决整个体系面临的现实问题时，这种社会赋权将更持久，更制度化并难以逆转。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赋权的努力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基于工人阶级的结社力量与资本家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达成某种稳定的、积极的阶级妥协。根据这一愿景，我们可以达到劳资双方互利合作的黄金点，亦如赖特所提到的，一个社会民主乌托邦。但是，共生式转型所带来的社会赋权空间的拓展或者说相对稳定的正向协作形式的创造，往往以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为前提，结果是在推动社会赋权与阶级妥协的过程中，虽然改善了劳工的处境，但也在客观上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一旦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重新掌握主动权，制度改革便可能遭遇削弱或撤销。对此，赖特的回答是，共生策略有可能为间隙策略的运作开辟更大的空间，而这种围绕扩大赋权形式的制度建设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历史条件下，使断裂性变革成为可能。

4 对赖特“真实乌托邦”方案的思考

埃里克·欧林·赖特的“真实乌托邦”方案并非旨

在提供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蓝图，而是立足于西方社会语境，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激活社会主义的想象力和实践路径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工具。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诊断、对社会赋权的重新定义以及对转型方案的系统梳理，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尤其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是继续在理论上固守革命理论或者脱离实际空喊革命？还是立足实践探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现实转型更可取？答案不言而喻。但是，正视赖特理论的局限性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赖特所设想的“真实乌托邦”实践，如合作社、社会经济等都深深根植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制度土壤。这些实践模式并不能简单地平移到其他文化与制度背景。例如，在以公有制为主的我国，如何将社会赋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基层治理以及与各社会方力量团结起来，是需要深入探索的议题。其次，赖特的理论在“改良”与“革命”的张力中徘徊。尽管他致力于寻找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替代方案，但这在一些坚持彻底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能被视为一种妥协。他的“真实乌托邦”策略，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在资本主义内部增殖非资本主义空间，最终实现“和平转型”的改良主义路径。这种路径能否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仍然是一个需要经历反复实践检验的问题。尽管如此，赖特的思想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吸收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上，更当如此。赖特所倡导的社会赋权、合作社与我们正在推进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理念上高度契合。特别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其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真实乌托邦”的伟大实践，而非空中楼阁，是立足于我国国情，通过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完善分配制度，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中，持续扩大社会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调节，逐步实现的宏伟蓝图。

因此，与其说赖特《真实乌托邦》一书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遥远的理想彼岸，不如说它提供了一套批判性反思的工具，鼓励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不断探索和创造属于当下时代的“真实乌托邦”。如赖特在本书结尾

所言：“我们无法肯定地描绘出可能性的边界并不是说我们理论想象力不足，而是复杂体系中非意图后果的衍生结果的固有问题。我们能做的，便是把在各种社会赋权路径上向前迈进的斗争，视为我们持续测试及再试可能性界限的实验过程，尽可能创造出能扩展界限本身的新制度。借此，我们不仅展望真实的乌托邦，同时也朝着乌托邦的实现迈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共同富裕的持续探索，正是在这样一场不断测试和拓展人类社会可能边界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前进。它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自身国情，我们不仅能够展望真实的乌托邦，更能够朝着乌托邦的实现稳步前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57页。

[2]吕佳翼：《何以及如何“侵蚀资本主义”——评欧林·赖特的《想象真实乌托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2年，第4期，第82页。

[3]Erik Olin Wright：《真实乌托邦》，黄克先译、林宗弘校订，新北市：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4]Michael Burawoy, "A Tale of Two Marxisms: Remembering Erik Olin Wright (1947-2019)", New Left Review, 2020, (121), p 69, 95.

作者简介：李静乐（2001—），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